

历史书写与公众参与

——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张 勇

摘要: 中国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活动渐趋昌盛。三线建设领域的历史书写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近十年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该领域的书写中,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阶段。参与书写三线建设历史的群体构成比较多元,学者、政府人员、媒体人、“三线人”等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书写动因、方式、作用和特点。公众参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主要包括研究论著的撰写、口述及回忆资料的整理和编撰、通俗作品的生产、历史物品及场所的利用等多种形式。不同书写群体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学者与“三线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他们正共同书写和解释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共享历史的话语权。公众参与使历史书写的对象和主体都产生显著的变化,会引发历史书写和史学发展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 历史书写; 公众参与; 三线建设

作者简介: 张勇,历史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8)02-0223-10

DOI:10.13658/j.cnki.sar.2018.02.029

近十余年来,中国公众参与历史记录和书写的活动渐趋昌盛,并形成热潮。随着“全民写史”的热潮,学术界开始倡导历史书写的“公众参与”,尤其是在公众史学领域。公众史学/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①于1970年代中期兴起于美国,经过40余年的发展,现已颇具规模。^②在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公众史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198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开始介绍美国公众史学,但直到最近十年,国内学界对公众史学的关注才逐步升温。无论国内外,公众史学家大都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③并对此进行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4XZS022);四川外国语大学年度科研项目“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isu201410)。

① 关于 public history, 中国学者翻译成不同的概念,如“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等,并有一定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公众史学”“公共史学”这两个概念。本文使用“公众史学”一词,但对两者不做严格区分。

②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李娜:《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③ Ronald J. Grele, "Whose Public? Whose History? What is the Goal of a The Public Historia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 No. 1(1981), pp. 44-48.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1页。

一些理论上的阐述,但并未结合某一历史领域的实践案例,对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情况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探讨。^①

从中国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实践活动来看,公众记录和书写的历史领域大多集中于现当代史。例如,抗日战争、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领域,既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普通民众书写的重点。笔者长期从事三线建设的研究,收集、整理资料,并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参加各类相关活动,与许多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及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有较多接触和交流,察觉到该领域的公众参与颇为活跃。因而,笔者拟以三线建设历史书写中的公众参与为实例,考察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发展历程、参与历史书写的群体构成、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形式、学者与三线建设亲历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以期对历史书写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有所启发。

一、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发展历程

“历史书写”是最近十几年新出现的名词,在大陆广泛使用于文学界,近些年在史学界流行开来,但为这一术语明确下过定义者却少见。综合前人的阐释和实际使用情况,笔者认为,历史书写是对历史进行记录、叙述以及解释、分析、建构的过程。朱渊清主张将历史书写分为历史记注、历史撰述、历史研究三大类,历史记注“是关于事实的实时记录”。^② 本文将历史记注与历史撰述合二为一,从而把历史书写分成“历史记述”与“历史研究”两大类。历史记述是对历史的记录与叙述,处于历史知识生产的初级阶段;历史研究是在历史记述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的分析与建构,处于历史知识生产的次级阶段。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既有初级的历史记述,也有次级的历史研究。关于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的历史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1980年代以前,在紧张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三线建设信息基本处于保密状态,极少有人书写三线建设的历史。19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国内着手进行经济领域的整顿与调整,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时期,方才出现记述三线建设历史的各类作品:一是为参加过三线建设的领导而撰写的传记或回忆录,二是有关政府部门编写的资料,三是纪实文学,四是各三线企业编写的厂史、厂志。这些历史记述多具有“官方”背景,或由相关部门牵头编撰,或由企业组织编写,来自民间的个人记述极少。这一阶段关于三线建设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针对三线建设的质疑而对其展开的讨论、评价,二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探讨三线建设的经济得失和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策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还比较少。这一阶段三线建设的历史记述官方色彩较浓,普通民众极少参与其中,历史研究成果也相对阙如,处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起步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三线建设信息的逐渐解密,三线建设及三线企业见诸报端,加之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三线建设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所关注,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录和书写也渐趋增多。这一阶段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历史研究成果数量增多,内容广泛,共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3部著作,涉及三线建设的原因及背景、实施过程、影响效应、历史评价、调整改造、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领导人与三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二是历史记述的方式趋于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回忆录、报告文

① 孟钟捷近来以德国历史学界研究“克服历史”之争的进展为例,探讨了德国在公共历史争议研究中的特征及影响,但并未专门探讨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问题。孟钟捷:《公共历史文化中的“克服历史”之争——近来德国公众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复旦学报》2015年第6期。

② 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2页。

学等形式外,人们还采用画册、电影、电视专题片等方式来记录和叙述三线历史。这一阶段开始有一部分三线建设亲历者撰写相关著述,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已渐具规模,处于发展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有关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发表了近300篇论文,还有近20篇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同时研究逐渐深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一是从宏大叙事的研究逐渐转向微观、细致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二是从以历史学、经济学为主逐渐转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视角来探讨三线建设历史问题的成果开始出现。^①在历史记述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新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记录与书写历史变得更为自由便捷,记述三线建设历史的作品大量涌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回忆录、老照片在网络上传播于各三线企业的职工之间,对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史工作正在开展,利用博物馆、企业遗址来记录三线建设历史的做法已付诸行动。最突出的是,近十年来,书写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更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及其家属)参与到历史记录与书写中来。这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标志着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参与历史书写的群体构成

公众是三线建设历史记录和书写的主体。“公众”这一术语在法学、政治学领域的含义较为明确,但目前历史学界的解释则不甚清晰和一致。美国公众史学家罗纳德·格雷认为,史学的对象——“公众”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当代史学的“公众”除了史学家和历史专业学生外,还包括史学工作者接触并教育的学院史学范围之外的“公众”,一些政府部门、法庭及管理机构、中小學生、历史小说和历史虚构性媒体作品的观众和读者等等。^②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只要是参与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人群,基本都可纳入历史学的“公众”范围中,而不用过多考虑其背景和身份。从我国历史书写群体的广泛性来看,也确实如此。当然,在不同的历史专题领域,参与历史书写的人群是有所差别的。那么,三线建设历史的书写者主要由哪些群体构成呢?

201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简称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虽名为“研究会”,但其成员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者。笔者对研究会第一届理事名单进行了统计。该研究会共有理事94人,其中,来自三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44人,占总人数的47%;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含退休的)32人,占34%;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学者15人,占16%;媒体从业人员3人,仅占3%。^③虽然这只是理事的来源构成,但也大致反映出涉足三线建设历史领域的人群结构。当然,在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实践中,企业职工、政府人员、学者、媒体人的实际构成比例有所不同,参与历史书写的动因、方式、作用和特点也各不相同。

1. 学者。学者是较早关注三线建设的群体,更是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主体,撰写了大量论著。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在新社会史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把目光从国家的宏观层面转向普通建设者和日常生活。除了历史研究外,学者们也做一些历史记述工作,如以口述史方法记录三线建设的历史信息,整理编写三线人的回忆文集。此外,学者为了收集文献资料 and 进行田野调查,需要和有关部门、三线企业及职工打交道,因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比较多。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就是研究者和政府有关部门、三线企业联合的结果。

① 详见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 Ronald J. Grele, "Whose Public? Whose History? What is the Goal of a The Public Historia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 No. 1(1981), pp. 42-47.

③ 笔者根据该研究会编辑的《三线建设研究·三线建设研究会成立大会专辑》(内部资料,2014年)统计而成。

还有一些学者开始面向公众,利用通俗文章、影像作品等多种方式记录和传播三线建设的历史信息。例如,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多家媒体合作,在《国家人文历史》、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都策划并推出了专题文章和纪录片。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以历史研究为主,更鲜有人秉承公众史学的理念去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到三线建设历史的记录与书写中来。

2.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这个群体一部分来自三线企业曾经或现在的主管部门,如中央和各省市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他们曾亲身参与过三线建设及调整改造的管理、组织或协调工作,对三线建设怀有特殊的感情,一些人退休后仍通过书写回忆录、编撰文献资料等方式来关注三线建设。另一部分来自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文广局或其他文化宣传部门,大多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参与到历史书写中来。出于提升地方知名度、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某些三线地区的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记录和宣传三线建设历史的活动。比如,作为当年三线建设重镇的六盘水、攀枝花、遵义等市,分别在当地兴建三线建设博物馆或文化园,组织编写三线建设志和口述回忆文集,并承办全国性的三线建设研讨会。政府的背景为其在联系亲历者、获取资料、采访记录、召集会议等诸多方面带来便利,在三线建设史的记录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明显作用,当然也使其成果的官方话语色彩较为浓厚。

3. 媒体从业人员。相关媒体人员主要来自期刊、报社、出版社、电视台、文化公司和网站,其成果有专题文章、新闻调查、纪实文学、纪录片、影视作品等形式。这些作品生动、直观、形象,影响较大。比如,畅销期刊《中国国家地理》曾两次刊登关于三线工业遗产和三线人经历的文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大三线》,都引发了广泛关注。此外,也有媒体人员出于自身的兴趣,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三线建设的记述,如《华商报》记者李杰历时十余载,拍摄了大量关于三线建设和三线人的照片,并结集出版。^①媒体人对三线建设的记录和书写,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与思考,也有对三线企业和三线人生存状况的现实关怀,其独特的视角和记录形式丰富了三线建设的书写内涵,在传播三线历史信息方面更有突出的影响力。

4. 企业及其职工与家属。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全国兴建了近2000家大中型三线企业。^②经历了调整改造和市场化浪潮后,仍有许多三线企业生存了下来。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志的风潮下,大部分企业都编写了本厂的厂史或厂志。近十年来,为了增强内部凝聚力,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加强对自身的宣传,一些三线企业注意挖掘自身历史传统,编写企业的三线建设史。

三线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则往往采用个人或小群体的方式来回忆和书写历史。他们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在群体身份认同感增强、个体意识觉醒以及现代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中来。三线建设亲历者作为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一个群体,对三线建设怀有强烈而复杂的感情,逐渐形成了对“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的认同。许多“三线人”退休后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在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其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经历坎坷人生的他们有了记录、书写这段特殊历史和人生故事的强烈愿望。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为更多普通的三线建设者回忆和记录历史提供了便利。在各三线企业的网站、贴吧、QQ群和微信群中,“三线人”从国家政策、建设历程到企业发展、个人生活的讨论此起彼伏,各种回忆文章和老照片层出不穷。“三线人”成为了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最广大参与者。

① 李杰:《“三线”记忆——一个火红年代的烙印》,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国防科工委三线调整协调中心:《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总结》,《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内部资料),2006年版,第27-40页。

可见,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群体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媒体界与“三线人”,来源构成复杂。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参与历史书写的“公众”来源构成也比较广泛,如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历史学家之外,还包括博物馆员、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在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的历史学家、影视业和媒体从业人员、中小学教师等。^①中国参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人员构成呈现多元化,历史学者、媒体从业人员、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三线人”则是参与历史书写的主体人群。

三、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形式

金光耀在研究中国知青历史问题时,将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梳理成三种形式:文学书写,即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史学书写,即关于知青历史的研究论著撰写;民间书写,即知青回忆录的写作。^②他所讨论的书写知青历史的主体都是经历过知青时代的知识青年,且书写手段侧重于文字。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主体构成则比较多元,书写成果较为丰富,书写的手段和形式也更为多样。根据作品的呈现方式,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可归纳为以下四种主要形式。

(一) 研究论著的撰写

学者是进行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主体,其他群体中也有少数人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等部门的研究人员。目前,已出版了多部研究论著,发表了400余篇学术论文,还有20多篇硕博学位论文,成果数量较多。这些研究论著涉及三线建设的原因及背景、实施过程、影响效应、历史评价、调整改造、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领导人与三线建设、三线区域研究等多方面的问题。在2010年以前,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人群、研究方法上仍存在一些缺陷或不足。^③

不过,近些年三线建设研究出现了一些较大变化,主要呈现两个发展趋势。其一是从宏大叙事的研究逐渐转向微观、细致的研究,甚至出现了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例如,胡悦晗以中部地区的两个工厂为例,考察了建设调整改造阶段三线企业迁入城市的问题;^④徐有威、吴静以上海建在安徽的八五钢厂为例,分析了小三线职工的婚姻生活;^⑤笔者以四川的三家工厂为例,讨论了三线建设选址及厂址变更过程中三线企业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关系。^⑥其二是从以历史学、经济学为主逐渐转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视角来探讨三线建设历史问题的成果开始出现。例如,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三线企业的社会性质及特征;^⑦段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甘肃天水市三线企业和安徽宁国县小三线企业的分布与选址问题;^⑧陈超从政治学的角度

① 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金光耀:《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③ 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④ 胡悦晗:《地缘、利益、关系网络与三线工厂搬迁》,《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⑤ 徐有威、吴静:《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⑥ 张勇、肖彦:《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⑦ 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⑧ 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段伟:《甘肃天水三线建设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

探讨了三线企业工人中三类带“标签”群体的职业机会、人际互动和组织依赖性；^① 施文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陕西汉中回沪“三线人”为例，研究“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② 虽然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论述与探析，都是历史书写的重要形式。

（二）口述、回忆资料的整理和编撰

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资料，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几乎所有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群体——政府部门、学者、企业及职工都意识到收集、整理这类资料的价值和紧迫性，参与到口述、回忆资料的整理和编撰工作中来。

在政府方面，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档案馆、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针对某一些三线建设者（如领导干部、优秀代表）做过口述访谈或邀其撰写回忆录，整理出版了若干资料文集。例如，重庆市党史研究室对该地区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多位领导干部做了口述史访谈；遵义市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写的《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收录了亲历者的100多篇回忆录；攀枝花市总工会采访了54位劳模和领导，出版了口述史文集《筑城——攀枝花下的三线人》。在企业方面，除了编写厂史、厂志外，部分三线企业还组织编写本厂的回忆、口述文集，如贵州长征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纂了《长征电器四十年》，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编印了《卫东记忆》。在学术界，也有学者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甚至做了一些口述史工作。比如，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一书就收录了他们采访的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③ 王小平在自贡做了许多当地“三线人”的口述访谈，笔者也主编有关于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文集。^④

回忆录、口述史的编撰主体还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这些“三线人”对三线建设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书写了大量的回忆录，部分人还接受访谈，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资料。有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个人自发撰写回忆录，如陈刚《三线的日子：我的1966—1979》、蒋辛《青春的回眸：三线建设者的奋斗故事》；也有某些破产企业的三线人联合起来，共同收集、撰写本厂职工的文集，如四川锦江厂编印了回忆录《锦江风云》和画册《锦江情韵》，四川913厂编印了回忆文集《中和风雨行》，江西小三线企业人民厂、9304厂分别出版了《我们的人民厂》《征程》等回忆录，重庆晋江机械厂收集、出版了《晋江记忆》等史料文集。这一类亲历者的回忆、口述文章，如今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在网络上层出不穷。

三线建设的回忆、口述成果数量众多，但水平却参差不齐，不同群体所做回忆、口述作品的特点及风格也都迥异。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在整理和编撰口述、回忆资料时，通常选择一些领导干部或“优秀人员”，内容也多为叙述建设的辉煌和个人的业绩，有明显倾向性。学者做口述历史工作时，力图抢救和保存更多的历史信息，但由于口述史进入三线建设领域较晚，目前在程序的规范性和对象的广泛性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提升。“三线人”所做的回忆录和口述史作品最为丰富，内容也较广泛。他们以此种方式记录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追忆彼此的生活、命运和逝去的岁月，并凝聚集体情感与身份认同，因此作品往往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

（三）通俗作品的生产

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通俗作品类型多样，包括文学作品、图片、纪录片及影视作品等。文

① Chao Chen. "Labeled clanizati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hird Line enterprise" Labor History, Vol. 57, No. 5 (2016), pp. 671-694.

② 施文：《“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张勇主编：《三线人生——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与调研》，九州出版社（待刊）。

学作品以报告文学和小说为主,报告文学有王春才主编的“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和沙明的《魂系三线》等,小说有《让历史记住:三线学兵》《青春滴血:三线学兵连绝唱》《工人》《上三峡》《失眠时代》《裂谷燃情》《大三线》等。^①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其作品虽具有明显的文学色彩,但对当年的历史事件及背景有较为真实的反映。

图片和纪录片也是记录历史的较好形式。各种关于三线建设的老照片、摄影作品大量涌现,有的甚至结集出版,如三线办主编的画册《中国大三线》、潘科主编的《三线学兵连》、李杰的摄影集《“三线”记忆》。各地电视台策划拍摄过一些三线题材的纪录片,如四川电视台和四川省三线办共同拍摄的10集系列片《三线·创业者的歌》、陕西电视台的九集电视专题片《三线学兵连》、中央电视台“亲历·亲证”栏目拍摄的《三线学兵》、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的《那时,阿拉在小三线》,香港凤凰卫视相继制作、播出了《三线往事》《血色青春:我在三线学兵连的故事》《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2016年和2017年,两部大型纪录片《军工记忆:三线风云》《大三线》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了较大反响。

此外,还有一些以三线建设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彭德怀在三线》《二十四城》《山楂树之恋》《爱在苍茫大地》《大丽家的往事》等。号称三线建设“三部曲”的《青红》《我,11》《闯入者》是在三线企业生活过13年的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含有他对三线建设历史记忆的影像表达。文学、影视类通俗作品虽有浓厚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加工色彩,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人们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留存了有关历史信息,可以算是一类特殊的历史书写方式。

(四) 历史物品、场所的利用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舒尔茨提出,了解和理解原始的历史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物、遗址、场景、文物、口述记忆、影像资料和电子文献等。^②三线建设时期的设施、设备、生活用品、建筑、空间等物品及场所,都可以利用来记录和传播历史知识,主要有修建博物馆和遗址利用等方式。

历史博物馆或陈列馆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物品编排,并结合文字、声音、视频等辅助手段,将其信息展示出来,是记述和传播历史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目前,四川广安市已兴建了首个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群中落成了“中航工业航空三线博物馆”,贵州六盘水市、四川攀枝花市也先后修建了三线建设博物馆。三线建设留下的大量企业或工程遗址,其中一部分已被利用、开发改造成文化创业园,三线主题酒店,工业遗址保护区甚至旅游景点。它们的保护和开发思路不尽相同,但都采用了多种方式进行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例如,近年816地下核工程遗址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其中景前区计划修建三线建设纪念广场和老兵纪念广场,树立三线建设的大事记纪念碑和支援816建设的单位纪念碑,镌刻数万名参与建设的工程兵名字,以此铭记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③

提供“在场感”是公众史学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物的布置、空间的利用、材料的呈现方式等都是传递历史信息的有效途径与手段,能使受众从再现的历史场景中汲取历史知识,并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④博物馆和遗址可使普通公众对三线建设的历史有更为直观和形象的认识。同时,博物馆修建和遗址利用过程中,需要向相关学者、亲历者咨询更多历史信息,从三线企业和职工那里征集各种用于展示的物品,这又加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

① 更多作品参见王小平:《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与当代文化生产》,《“中国三线建设遗产价值与品牌建设”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12月,第113-119页。

② Constance B. Schulz, “Becoming a Public Historian”,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Iahalia, eds., *Public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Malabar: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p. 32-33.

③ 笔者曾赴这些遗址进行过考察,816工程的升级改造情况为2016年实地调研时获知。

④ 张文涛:《在场感与西方公众史学》,《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四、历史书写群体之间的互动

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群体构成广泛,包括学者、政府人员、媒体人和“三线人”等。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互动较为频繁,究其原因,一是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工具的迅速发展及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变得更为方便;二是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识壁垒得以打破,交往日益增多;三是三线建设的书写群体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全国及各地的三线建设研究会及其下属的网站、QQ群为他们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平台。学者是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主体,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三线人”则是历史记述的主体。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和合作的结果”。^①在古史等领域,史学家无法和“当事人”进行直接对话;而作为当代史三线建设领域则不一样,学者和研究对象——“三线人”之间可以有较多的交流和对话。因此,下面主要探讨学者与三线人的交流、合作及影响。

学者和“三线人”既有面对面的交流,也有依托网络等媒介进行的交流。近几年各地陆续召开各种主题三线建设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和“三线人”相互交流信息,对一些问题展开探讨,甚至达成某种合作意向。学者在外出调研时,接触最多的还是“三线人”,他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更为深入。此外,借助电话、邮件、贴吧、QQ、微信等媒介,学者可以和“三线人”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笔者发现,在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组建的“三线家园”QQ群里,研究者和亲历者是最为活跃的两种群体,他们之间的讨论、交流较为频繁,讨论的话题也较为广泛。

学者还与部分“三线人”在历史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业遗址的保护利用等方面进行合作。例如,《三线风云》这部历史文集就是由一些三线建设亲历者和学者共同策划、收集并整理出版的。^②再如,重庆市江津区夏坝镇原有3家三线企业,其中的晋江机械厂搬迁、合并入巴南区的大江工业集团,在夏坝只留下了厂房、宿舍等遗址。一些退休的原晋江厂职工组织起来,编写本厂的厂史和回忆文集,并计划对工厂遗址进行利用和开发。受他们邀请,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研究者参与这些事务,为其厂史、文集的编撰提供参考,对工业遗产的利用也提出了若干建议。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当地做口述访谈、专题调研时,这些“三线人”也积极予以响应和配合。

学者和“三线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学者来说,通过与“三线人”的接触、交流与合作,既有助于调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资料信息的充分收集,还可以深入了解“三线人”群体,纠正某些固有的看法。在“三线家园”群内,曾有学者与数位“三线人”就三线建设与某位领导人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度火药味十足。学者发现,学界原本已得到公认的一些问题,在这些普通民众和事件亲历者的头脑中却是另外一种看法,“三线人”的历史认同与情感问题需要重新审视。^③对于“三线人”来说,学者不仅可以为其文集的编撰提供指导,还可能会在意识观念上对其产生影响。笔者在进行三线建设亲历者的个人史访谈和回忆录收集时,与数十位“三线人”进行过交流、合作。最初,有的“三线人”不甚理解,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职工,没有做口述史或撰写回忆录的必要。经过多次的沟通后,一些

① 王希:《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倪同正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与本文相似,邵鸿在研究曹操墓的认定风波时探讨了历史学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争论和对话。不同的是,在三线建设领域,学者是直接与会的亲历者进行讨论和对话。参见邵鸿:《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对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初步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人的观念逐渐开始转变,意识到了个人史书写的意义。有一位三线亲历者在修改他的回忆录时,发来邮件谈起与笔者交流后的感想:“(你)从民间的范畴引导我将视角由‘大’转‘小’,方开始关注与重视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所亲历的不仅能够感动自己、而且易于让今人触摸的‘小故事’。”他似乎已隐约感悟到“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史学理念。

许多新史学的实践者一直希望推倒两道墙:“那些将人民与他们的历史分离开来的”和“那些将研究历史的人与曾亲历历史的人分割开来”的墙。^①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弗里茨提出“共享话语权”理念,也是旨在倡导宽容的历史解释权,主张与公众对话,共同解释历史。^②在三线建设历史书写过程中,不仅历史学者、政府人员,还有普通民众(尤其是亲历者)以及媒体都参与进来,相互对话、合作与影响,共同书写和解释着这段历史。^③

五、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近十年书写者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更多的公众(特别是三线建设亲历者)参与到该历史领域的书写中来,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新阶段。参与书写三线建设历史的群体构成比较多元,学者、政府人员、媒体人、“三线人”等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书写动因、方式、作用和特点。除了文字外,录音、影像、物品及场所也是记述历史的重要手段,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主要包括研究论著的撰写、口述及回忆资料的整理和编撰、通俗作品的生产、博物馆及遗址的利用等多种形式。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学者与“三线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正共同书写和解释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共享历史的话语权。

通过对公众参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探讨,还可以形成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历史书写形式多样,不同书写人群各有其擅长的书写方式。总体来看,历史书写包括历史研究和历史记述两大类。历史研究由于其专业性,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和理念,并经受专业的学科训练,因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者,只有极少数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员。历史记述则不同,其进入门槛较低,普通公众也可以进行记述。三线职工及家属、记者、制片人、政府工作人员等人群都参与了三线建设历史的书写,虽然一些亲历者由于年事已高难以亲自书写,但通过口述历史等形式,他们也能参与到历史记述的活动中来。因此,历史研究是小众的,历史记述却可以是大众的。

第二,学者和其他参与历史书写的群体应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互动。这一点在近些年举办的公众史学研讨会和历史嘉年华等活动中已有所体现,但在具体的历史领域还有待加强。除了对话外,历史学者还应该倡导更多的公众参与历史书写,并给予一定理念和技术上的引导。目前三线建设的口述史作品数量不少,水平却参差不齐。原因在于口述历史看似简单,实际操作流程却十分复杂,它要求操作者“除了理解必要的口述史学的理论以外,还需要充足的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专业训练,以及做大量的案头工作”。^④因而在做口述史时,需要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不同书写群体之间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和合作,才能生产更多

① James Green, *Taking History to Heart: The Power of the Past in Building Social Movemen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p.1.

② Michael H.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③ 在这些不同书写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并会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这些矛盾、冲突与共识也是公众史学的关注内容之一,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笔者当另文探讨。

④ 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9页。

有价值的历史知识。

第三,在当代史领域,参与历史书写的主体人群多与该历史事件有关,其书写积极性受历史认同等因素影响。三线建设历史记述的主体是“三线人”,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与三线建设发生过交集,因而比其他人更为关注该领域的历史书写。许多三线亲历者对于书写历史表现得较为积极,这也和他们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及自我认同有关。有别于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负面评价,大部分三线人对国家开展三线建设持理解的态度,并认为他们自身的行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因而愿意参与该事件的历史书写。^①所以,历史事件的相关人群应当是公众史学家引导参与历史书写的重点对象。

倘若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历史书写几千年的变迁历程来看,公众参与历史书写无疑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历史的书写对象(内容)和书写者(主体)的变化为参照,中国的历史书写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在古代的传统史学时期,历史书写最显著的特征是官方书写,由朝廷的史官来进行历史记录与编撰,帝王将相和重大事件是书写的主要对象,因而传统史学被后人称为“君史”。虽然彼时仍存在一些民间书写的因子,但官方以外的历史被称作野史,没有正统地位,其影响远逊于正史。近代之后,在现代国家与国民意识增强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要求书写“民史”的史学理念。梁启超等知识精英提出了抛弃“君史”、倡修“民史”的主张,认为史家应该以“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为目标,“民史”即是以国民为主体的历史。^②“民史”观的提出将历史书写的对象从帝王将相扩大到了国民大众,历史书写理念出现了重大变化。“民史”观虽扩大了历史书写对象,但其书写者仍是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道路不甚理想,可谓“步履维艰”。^③在20世纪,中国的史学还出现了政治化和学术化、科学化的倾向。政治化倾向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而科学化、学术化倾向则使科学性与人文性呈现二重的“疏离和对峙”,^④历史研究与历史记述渐行渐远,并形成了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学院史学”。其间虽有社会史学家倡导“目光向下”,关注民间和人民大众,^⑤“自下而上”地看待历史,但这仍是职业史家进行的历史研究,少有普通民众参与进来。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普通民众的历史书写意识得以增强,特别是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和新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个人进行历史书写更为便捷、自由。官方和职业史家无法再垄断历史的书写与传播,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记录和书写历史的行列中来,并朝着“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的趋势发展。学院史学家和公众史学家开始摒弃成见,进行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有了多种渠道的交流与互动。至此,历史书写的对象和主体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并进而促使书写形式、传播方式乃至史学观念的转变,由此可能会引发历史书写和史学发展的巨大变革。

① 当然,也有一些“三线人”认为三线建设存在若干问题,尤其是对企业发展、个人待遇、子女就业等问题存在一定的看法,这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和接受采访时亦有所流露。

② 史文:《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第50页。

④ 朱发建:《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⑤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